

西方衝擊下的世界

——對三個現代化歷程的反思

● 陳方正

Marc Raeff: *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Raymond Carr: *Modern Spain 1875-198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俄羅斯：對現代世界本質的錯誤判斷？

終帝俄二百餘年之世，改革和現代化可以說幾乎從來沒有停頓過，也沒有碰到任何重大政治或宗教阻力。相比之下，土耳其和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就坎坷艱苦得多了。

在十六、七世紀西歐崛起之後，其他古老帝國相繼受到強烈衝擊，因而必須改弦更張，大事革新，以應付前所未有的變局。在這些所謂「後進現代化國家」之中，最幸運、最值得土耳其、中國、日本等豔羨的，無過於俄羅斯帝國了，因為前者所必須面對的許多難題，對它而言都不存在。

首先，由於地緣相接，俄國很早即直接感受歐洲變革的強大衝擊，在十七世紀之初更幾乎由於波蘭和瑞典入侵而亡國。很自然地，到了十七、十八世紀之交，飽受刺激的俄羅斯就已經銳意革新，走上現代化道路，這比諸前述三個古舊帝國足足提早了一個半世紀。在這時，它所須彌補的落後差距還相當小，而對許多其他國家來說，如何在短短數十年間完成歐洲經歷數百年功夫才逐步完成的變革，正是最大難題。

其次，具有悠久淵源和強固政治、社會結構的古舊帝國，破舊立新還有另一個難題，即缺乏領袖：有新思想、新眼光的人才往往不在其位，即或一時蒙君主破格擢用，也不免受盡舊勢力梗阻、攻擊，難以充分施展抱負。俄國則全然不同：它的革新動力正來自獨攬大權的沙皇本人。十八世紀的彼得大帝和卡特琳娜大帝雄才偉略，見識超

邁，自不待言，即使其後的亞歷山大一世、二世和斯佩蘭斯基 (M.M. Speransky)、韋特 (Serge Witte)、斯托里平 (Peter Stolypin) 等，又何嘗不是明君、賢相，何嘗不是有魄力、有作為的政治家？終帝俄二百餘年之世，改革和現代化可以說幾乎從來沒有停頓過，也沒有碰到任何重大政治或宗教阻力。相比之下，土耳其和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就坎坷艱苦得多了。

第三，俄羅斯雖然有別於西歐，但兩者的根源卻十分相近：就民族而言，俄國雖以斯拉夫人為主，但創建它第一個政治體即基輔公國的，則是來自斯干的納亞半島的華朗根武裝移民集團；就宗教而

言，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同源；就政治而言，俄羅斯承襲了拜占庭即東羅馬帝國傳統，並且在君士坦丁堡覆滅之後以「第三個羅馬」自命。因此，對於接受西方事物，引進西方思想、文化，俄國民眾雖然也一樣有抗拒情緒，但比諸土耳其教士和中國士大夫階層那種強烈的憎惡與排斥心態，則相差甚遠。

最後，俄國由於進行改革較早、較全面，所以很快就建立了強大軍事力量，不但在西歐浪潮衝擊下足以自保，而且還有餘力干涉歐洲事務，被承認為所謂「歐洲協同國」(European Concert) 成員。所以，它的種種革新措施和建設得以在不受外力干擾的情況下從容構思

在所有歐洲以外的國家之中，俄國的改革無疑應該最成功，最能帶領它進入現代。然而，不可否認，從最基本的層次，即建立一個健全、整合、蓬勃有生機、能適應現代世界的國家這一點來看，俄羅斯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現代化卻徹底失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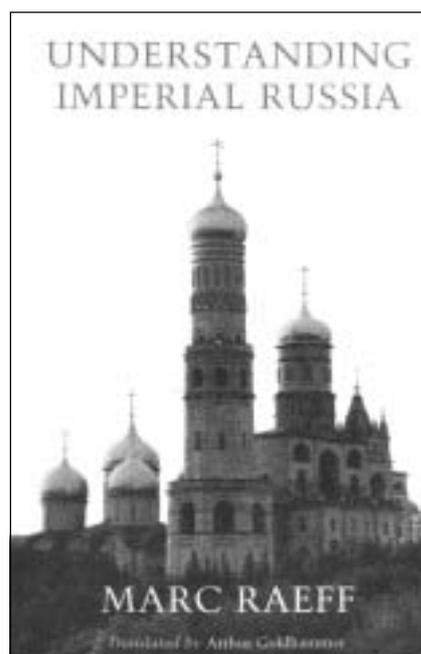


和推行：對它來說，租界、治外法權、關稅自主、外國資本佔據市場等等都根本不成問題。在後進現代化國家之中，它是惟一不必應付帝國主義侵略的——其實，如所周知，它自己根本就已經是帝國主義的一部分。

從以上四點看來，俄國佔盡了現代化的有利條件，在所有歐洲以外的國家之中，它的改革無疑應該最成功，最能帶領它進入現代。從某些角度看，這的確也是事實：在本世紀初，它在軍事、文學、科學、音樂、藝術乃至都市建設和工業生產等各方面的成就已經接近歐洲先進國家，在有些領域甚至領先了。然而，不可否認，從最基本的層次，即建立一個健全、整合、蓬勃有生機、能適應現代世界的國家這一點來看，俄羅斯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在最理想條件下銳意推行的現代化卻徹底失敗了：它畢竟不能避免大革命、大動亂和社會的整體崩潰；而且，經過國家和社會全面重組之後，仍然未能解決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癥結，例如農業生產落後和社會、民族對國家缺乏認同等問題，因此在七十餘年之後，又再要忍受另一次整體崩潰的打擊。

俄羅斯這種弔詭的失敗的基本原因到底何在？拉伊夫 (Marc Raeff) 教授這本篇幅不多、但灌注了多年研究和思考結晶的著作《獨裁下的危機與嬗變》(*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便正是企圖通過分析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而找到答案。

拉伊夫的基本觀點是：在帝俄，以沙皇為首的國家是主動的，



是改革和現代化的原動力，但它以獨斷、強制方式改造龐大、頑惰社會（包括農民、小地主、小商人和逐漸興起的官僚階層）的努力卻往往落空，甚至產生意料之外的相反效果。因此，他對彼得大帝的雄圖偉略頗有保留：「全面看來，國家有關服役貴族和知識精英的目標是達到了，但就平民而言，則直至十八世紀中葉為止，可說是徹底失敗。」對尼古拉一世時代興起的著名知識份子，如赫爾岑、巴枯寧、奧加列夫等，他評價更低，認為只不過是十分孤立的一小撮人，自命為「能為大眾指示前途的激進意識形態宣道家：這是他們為自己界定的角色，也是在現代世界自我認同的功能」。在他看來，他們對實際改革沒有，也不願意作出任何貢獻，而選擇成為死硬反對派，從而造成俄國政治的兩極分化。正是這牢固、不可改變的兩極化，阻止了具有自主性的俄國公民社會出現。

拉伊夫認為：真正的現代化必須是自發的、連鎖反應式的社會蛻變，是其本身規範的建立和意志的表現。因此，是不能從外部加以領導和控制的，無論領導和控制者多麼開明、睿智、有遠見。

他所讚賞的，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出現，他稱之為「有根」的專業知識份子：他們代表「獨立的宣言，從意識形態糾纏的擺脫，以及回到現實，認真面對現實的決心」。在這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文化果實。

然而，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羅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康丁斯基等天才人物雖然個別成就輝煌，卻並沒有對社會整體發生指引作用，也未能幫助俄國社會找到「一套完整，能指導它參與政治運作和經濟發展的價值、原理和行為標準」。也就是說，俄國社會沒有能力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它失敗的根源。拉伊夫認為：真正的現代化必須是自發的、連鎖反應式的社會蛻變，是其本身規範的建立和意志的表現。因此，是不能從外部加以領導和控制的，無論領導和控制者多麼開明、睿智、有遠見。所以他說：「(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計劃的致命傷在於它是基於一個靜態世界觀，這是對現代世界本質的錯誤判斷，因為它忽視了現代化過程所釋放出來的動態力量。」也許，俄羅斯長達兩個世紀(也許還包括蘇聯長達七十年)之久的現代化，在最理想的條件之下仍歸於失敗，就是由「對現代世界本質的錯誤判斷」而產生的吧？

把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的現代化歷程與俄國對照，也許我們不必再為林則徐、曾、左、李、康、梁等政治家、改革家之生不逢時，或者頑固的慈禧太后之對改革橫加阻

撓而扼腕長歎，更不必為康熙皇帝錯過了東、西方文化在近代第一次接觸這一早期現代化契機而感到惋惜了。因為，以中國歷史之悠久、傳統文化之深厚，以及與西方事物之隔膜，希望碰上或創造比俄羅斯更優越的改革條件顯然是不現實的。更何況，到頭來這些條件對現代化成功與否其實並沒有太大關係！值得我們關心和審慎思考的，更當是過去二十年間，在一個新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出現的社會自發性蛻變，和它所連帶推動的現代化進程，要怎樣才能夠穩健地持續下去吧。

西班牙：惶惑的旅程

現代化從西歐開始，但歐洲並不是一個單純整體，而是許多不同國家的集合。這些國家之中最特殊的，也許要算是西班牙了。在十六世紀，無論從政治、軍事、海外殖民的角度看，她都是歐洲最先進、最強大的帝國。然而到十八世紀，這個現代化的先驅卻已經沒落，成為歐洲邊陲一個沒有活力，不受尊敬，甚至不受注意的二流國家。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當革命和自由思想終於傳到西班牙，並且產生政治影響的時候，她好像應該能趕上中歐的「遲現代化國家」——意大利和德國了。意想不到的，那只不過是她在政治曠野中長達整一個世紀的飄泊之開始。這我們稱之為「惶惑的旅程」，便是雷蒙德·卡爾(Raymond Carr)這本現代西班牙史(*Modern Spain 1875-1980*)的主題。

在歷史上，塑造西班牙性格，激發它輝煌成就，同時也決定它淒涼沒落的，是三個相關主題：宗教、民族和征服。

西班牙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惶惑旅程應如何解釋呢？也許，答案在於西班牙的保守力量太強太牢固，所以無論從天主教會內部，抑或從社會其他部分，都不能產生與傳統決裂的力量，從而形成政治突破。

要了解現代西班牙，必須稍為回顧它前四百年的歷史，因為困擾這個國家的，正是歷史和傳統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歷史上，塑造西班牙性格，激發它輝煌成就，同時也決定它淒涼沒落的，是三個相關主題：宗教、民族和征服。1469年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強大的兩個王國卡斯底和亞拉岡締姻，揭開了近代西班牙的序幕。在隨後半個世紀（1469-1516）間，伊莎貝拉和法迪南這兩位年輕有為、信仰虔篤的「公教君主」攜手成就了三件大業：統一半島上林立的基督王國；攻下南方的格拉納達，也就是盤踞在半島上已達七百年之久的回教徒最後一個據點；資助哥倫布西航，並在他發現的新大陸開拓殖民地。隨後，在雄才大略的查理士五世（1516-1558）治下，龐大的美洲殖民帝國建立起來，數以噸計的黃金和白銀源源不絕地從新世界流入半島。作為西班牙、美洲，還有大量歐洲領土的統治者以及神聖羅馬皇帝，查理士在位四十年的夢想就是克服各種（特別是法國的）阻力，一統基督教世界。繼承他的腓力二世（1556-1598），是一個謹慎、勤奮而具有熾熱宗教信仰的人：父親要建立大帝國，他則致力於維持教會正統和信仰純潔。不幸，和時代背道而馳的這兩項大計都徹底失敗了：查理士沒有打敗法國，腓力二世也不能征服信奉新教的荷蘭，更不要說已建成強大海軍的英國。父子二人數不清的戰爭沒有帶來任何成果，只是使國庫虛竭，社會貧困離心而已。

到十七世紀，歐洲迅速走向世俗化、資本主義和高度中央集權政治，西班牙則仍然停留在中古形態：一個只知追求宗教正統和大帝國夢想的僵化指令性政治結構，沉重地積壓在許多具有不同語言、風俗和法制特權的民族之上；商業、民生、科學、新思想都為一個世紀之前的宗教理想和征服者形象所窒息，都不能發芽、生長。正如著名西班牙史家比森斯比韋斯（Jaime Vicens Vives）一針見血地指出：「加斯底不了解資本主義世界，所以無法與歐洲競爭。這就是今日西班牙歷史中心問題的關鍵。」

處於緊貼歐洲心臟的位置，而又不了解迅速興起的資本主義和它所帶來的變化與力量，是十分危險、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腓力三世（1598-1621）和四世（1621-1665）這兩位繼位君主沒有意識到這危險，只是盲目地背着歷史枷鎖掙扎，企圖恢復上一世紀的光榮。結果到十七世紀末葉，帝國的歐洲屬土就輕易為列強所瓜分，西班牙皇位本身也為法國波旁族系（House of Bourbon）所奪去。雖然它的海外殖民地要到十九世紀才相繼喪失，但叱咤風雲的西班牙帝國則隨着十七世紀終結了。在其後一個半世紀，波旁皇朝把理性改革和歐洲思想引進西班牙的努力並不成功；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入侵、自由思想的傳播和多次民眾起義對政局造成了衝擊，但也都沒有產生任何深遠、持久影響。

所以，當進步黨人獲得軍方支持，在1868年發動不流血政變和革命，為民主憲政揭開序幕的時候，

西班牙在思想、社會或政治等各方面，都是極度混亂、分散、缺乏一致性和凝聚力的。這種混亂反映於它五花八門、令人迷惑的許多政黨和政治團體。例如屬於左派的，有社會黨、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屬於右派的，有保守黨、長槍黨、軍隊勢力、皇黨和種種天主教組織；中間派則有進步黨、自由黨、共和黨等等；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激烈的地方民族主義政黨，它們全部加起來，總數恐怕有二、三十個之多。這樣，在隨後漫長的百餘年間(1868-1975)，西班牙經歷了兩度共和、兩度內戰、長時期腐敗、不穩定的君主立憲，和兩度軍事強人獨裁，自然是不足為奇的。

在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崩潰是由於十六世紀傳統與新時代相背造成，那麼它在十九、二十世紀的惶惑旅程又如何解釋呢？它並非缺乏接受新思潮感染的機會——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憲政思想都從只隔着比利牛斯山的法國和只有數百哩水程的英國迅速傳入，而且生根發芽；它也絕非激進、拋棄傳統——教會勢力始終根深蒂固，而除了軍人獨裁和其他短暫時期之外，波旁皇室穩如磐石；它更沒有摧毀民間社會：地方民族主義不但強大，而且直接影響全國政治。

也許，答案在於西班牙的保守力量太強太牢固，所以無論從天主教會內部，抑或從社會其他部分，都不能產生與傳統決裂的力量，從而形成政治突破。這一點，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像宗教審裁所這麼一個制度，要一直到十九

世紀初才初次正式受到挑戰，而教會還堅決反對廢除。第二，要到1898年美、西戰爭的時候，因為一下子喪失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賓等三處海外殖民地，西班牙才初次感到全國性的危機與震撼。然而，由此激發出來的所謂復興運動(regenerationism)，在極大程度上仍然只不過是一系列缺乏思想內涵的政治口號，對國民意識並沒有真正衝擊。在這個時期西班牙最出色，最有深度的文學家，最能捕捉民族靈魂的思想家要算是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了。但他的《生命的悲劇意識》(*The Tragic Sense of Life*)這本名著卻是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理性的嘲諷，對羅耀拉、特倫特會議、救贖和永生(他稱之為「超越經濟學」)的頌揚，和對現代的憤怒與蔑視：「我們沒有科學精神？那又怎樣？我們有其他精神……讓其他人去發明好了……我們有自己的工作。」魯迅剖析狂人心理，創造阿Q典型，為的是對「吾國與吾民」作無情鞭撻；烏納穆諾則恰恰相反：他倔強地說：「吉訶德先生正是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因而不朽」，藉以表明西班牙在失敗中的不屈氣概。

是的，在走向現代之前，英國有它的議會造反和清教徒革命；日本有它的雄藩內部政變以及幕藩戰爭；荷蘭、美國都經過獨立戰爭洗禮；至於法國、俄國所經歷的思想劇變和大革命，以及土耳其在凱末爾時代所經歷的猛烈政治、宗教和思想革命就更不必說了。這和中國之必須經歷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在

最能捕捉民族靈魂的思想家烏納穆諾表現出對現代的憤怒與蔑視：「我們沒有科學精神？那又怎樣？我們有其他精神。」「吉訶德先生正是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因而不朽」，藉以表明西班牙在失敗中的不屈氣概。

和傳統決裂之後，才能向新時代、新體制邁出第一步。而對西班牙來說，也許是由於與回教徒七個多世紀的艱苦鬥爭，以及十六世紀帝國成就之輝煌在民族心理上所產生的偏執，正統天主教意識無論在政治抑或思想上都變為牢不可破，因而這一關鍵性決裂姍姍來遲。它的初次出現，恐怕要算是1936-1939年那一場震驚全世界的酷烈內戰了。沒有30年代這一趟憤怒、拼命的血與火之洗禮，這一場對全西班牙人存在承擔 (existential commitment) 的考驗，那末在70年代中期佛朗哥漫長的專政結束之後，穩定的民主立憲政體是否能那麼自然、順利地出現，而且為絕大多數人接受、擁護，恐怕還是有疑問的。

競逐富強：現代化的熔爐

十六世紀中葉(1543)葡萄牙人到達九州南部的種子島之後，日本軍事史上發生了一個重要但鮮為人注意的變化。當時正值中央政權崩潰的所謂「戰國時代」(1467-1600)，各地群雄並起，爭奪「天下」霸權。因此剛剛傳入東洋的火槍迅速為軍隊採用，它的研製、改良、操練也成為藩主、將領、武士悉心探究的要務。當時公認為最偉大的天才軍事家武田信玄就是受火槍的長距離狙擊喪生，而織田信長在著名的長篠之役(1575)能夠徹底擊潰武田勝賴，主要得力於埋伏在河邊的上萬名火繩槍手。這說明在短短一代之間，火槍就已經能夠左右日本政治、社會了。根據貝林

(Noel Perrin) 在《放棄槍械》(*Giving Up the Gun*) 這本小書發表的研究，這時日本陸上火器之精良和應用之普遍，已經超過英、法等西歐先進國家。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兩個半世紀之後美國人以武力打開日本大門，卻發現她的一般民眾對槍械感到十分陌生，甚至茫然。事實上，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槍械就逐漸從日本社會消失了，原因是已經一統「天下」的德川幕府有意識、有計劃地把槍械製造技術和人才集中起來，收歸國有，然後任其萎縮、廢棄、失傳。這個政策一方面是為了維持武士這一龐大統治階層的社會地位(用槍比用武士刀容易得多，一般民眾可以輕易掌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戰亂已經平息，一個統一、和平、沒有嚴重外患的國家根本不需要太犀利的武器，特別是要防止它在社會上流傳。因此，在維持穩定的大前提下，已經發展起來的先進科技被壓制，萌芽中的軍事鉅變以小小一段插曲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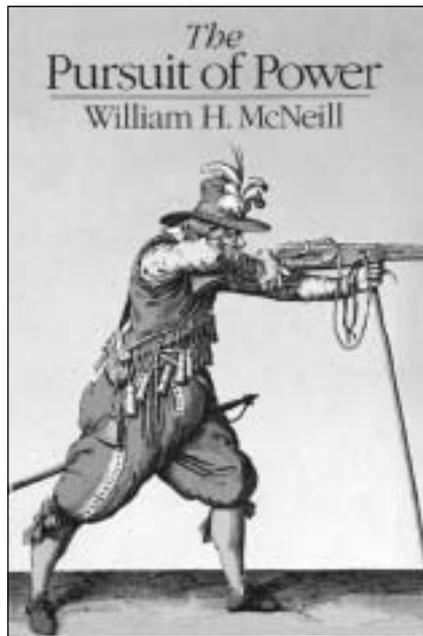
這段史實可以為了解洋務運動提供一個新角度：以器械為急務的「船堅炮利」政策也許並無不妥，只不過主事者力量不夠龐大，意志不夠堅決，因而無從「動搖國本」，迫使中國的政體、社會、意識形態適應發展先進器物的需要，甚至產生本身蛻變罷了。換而言之，「西用」的邏輯不足以改變「中體」的結構，因此研製和改良器械所必須具有的心思、資源始終無法集中、調動，所得的結果也就無從與歐西、日本比拼。日本在德川家康統一「天下」(1600)之前和之後對火器態度的大

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槍械就逐漸從日本社會消失了，原因是已經一統「天下」的德川幕府有意識、有計劃地把槍械製造技術和人才集中起來，收歸國有，然後任其萎縮、廢棄、失傳。

轉變，正好說明體、用二者孰為優先的選擇，是決定於政治形態的。

麥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的《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 所為我們帶來的，是這觀點的另一種論述：即歐洲的長期分裂造成劇烈軍事和政治競爭，由此產生的巨大壓力迫使各國必須不斷變革以求生存，從而為軍事體制 (包括武器和軍隊組織) 的改進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自然環境。因此，西歐並非先有現代價值觀、人生觀才產生現代政治、社會制度，才出現工業文明。實際上，它在思想、宗教、軍事、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急劇變化，是通過這些領域彼此之間的強烈刺激與相互作用而同時發生、同時進行的。

要說明這種動態連鎖反應，西班牙和荷蘭在十六世紀末的衝突是一個好例子。當時連同荷蘭在內的所謂低地國家 (Netherlands) 還隸屬於剛剛征服美洲的強大西班牙帝國，但為了新、舊教之爭，兩者斷斷續續打了將近八十年的仗 (1570-1648)。這長期衝突激發了荷蘭的民族主義，促使它成立歐洲第一個共和國；跟着，為了抵抗西班牙人大舉入侵，這似乎弱小的民族國家在毛里斯親王 (Prince Maurice of Nassau) 領導下完成了一整套劃時代的軍隊組織、訓練和作戰方式的革命，其嚴格方法、理性精神乃至系統教材和軍校制度也迅速傳遍歐洲，為所有先進國家仿效。更驚人的是，在南方移民大量湧入和維持海外貿易需要的雙重刺激下，荷蘭不但從一個繁盛的轉口港發展成為國際商業中心，並且又建立強大海



軍，取代葡萄牙的遠洋殖民帝國地位。可以說，為了抗衡西班牙，荷蘭在政治、社會、軍事、經濟上都發生了整體性鉅變。事實上，相類的蛻變不斷在不同時代發生於其他許多不同國家：歐洲的現代化就是這樣在衝突、競爭的熔爐中煅煉出來的。

麥尼爾這本醞釀、用功達二十年之久的著作還另有一個鮮明主題，那就是「富」和「強」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用他的話來說，「市場化的資源調動緩慢地發展，逐漸證明它比指令 (command) 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體」，因此，「到十六世紀，甚至歐洲最強大的指令結構在組織軍事和其他主要事業時，也要依賴國際貨幣和信貸市場」——以商業為基礎的荷蘭之所以成功，以帝國官僚結構為基礎的西班牙之所以失敗，就是明證。在十八、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成功和同樣優秀的法國之所以失敗，關鍵也基本相同：以海軍和海

西歐並非先有現代價值觀、人生觀才產生現代政治、社會制度，才出現工業文明。歐洲的現代化是在衝突、競爭的熔爐中煅煉出來的。

政治分裂、軍備競賽和資本主義果真是人類之福嗎？麥尼爾展望未來幾百年，全球性政府可能出現，競爭和攻擊只能在體育活動找到出路，人類社會又回到正常狀態。

外貿易為本的英國始終嚴格遵從市場原則，所以能夠藉英倫銀行建立牢固信貸機制，並通過全球性經濟網絡來為戰爭調動資源；至於以陸軍和大陸官僚架構為主的法國，則始終未能完全擺脫指令經濟的干擾，因此動員力量相對減弱許多。英國之所以能夠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擊敗法國，並囊括後者在北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利益，關鍵正在於此。

這可以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秘密：只有通過它的非強制性，但又無孔不入的「無形之手」，才能籌集發展先進軍備所需的龐大資金；另一方面，軍備所提供的強大武力，和戰爭的巨大消耗，又反過來保證和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兩者之間形成互相加強的正反饋循環。因此，軍備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雖然並非全部)機制。麥尼爾把本書的目標界定為「試圖彌合分隔軍事史和經濟史以及編史工作的鴻溝」，是再恰當沒有了。

當然，歐洲的分裂狀態與資本主義—軍備發展紐帶這兩個主題，也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在大一統政治格局之內，指令型經濟可以輕易壓倒市場經濟，把它局限於細小規模之內，而且軍備發展也沒有迫切性。因此，兩者之間的正反饋循環是無從建立的。本書用相當篇幅討論宋代商業，以及當時為了抵抗北方民族入侵而出現的冶鐵工業飛躍發展(神宗時代中國的鐵年產量已達十二萬噸，超過工業革命早期的英國50%以上)，目的正在闡明當時資本主義之所以不能進一步發展，是受到中央官僚政府基於道德理念

和本身穩定要求這兩個原因的抑制。反之，「只要沒有單一政治指令結構能夠把手伸向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從而把資本主義累積消滅於萌芽狀態，那麼基本現實就是市場會凌駕於當時(歐洲)最強大統治者的君權之上」。所以，「富」與「強」的紐帶，必須在容許不斷「競逐」的政治環境之中，才能牢牢建立起來。

然而，狂熱、不受控制的競逐富強造成了人類前所不能想像的效率，帶來了空前的力量和財富，卻也同時把人類推到受核子戰爭毀滅的邊緣。政治分裂、軍備競賽和資本主義果真是人類之福嗎？歷史學家無法預言未來，但省察過去和展望將來，又可說是他辛勤伏案之餘的自然權利。麥尼爾並沒有放棄這權利，而且，他對二十一世紀的看法可能令讀者十分驚異：「展望未來幾百年，我想後人很可能將本書論述的一千年看作是一個不尋常的動亂時期。」在那時，全球性政府可能出現，個人利潤的追求會抑制在一定限度，競爭和攻擊只能在體育活動找到出路，社會變革會慢下來……，總之，「人類社會又回到正常狀態」。

這樣一個美好的願望是否會實現，能在多少個世紀之內實現，自然沒有人知道，但這本書那麼客觀和深入的剖析，以及書末所表達的這一願望，應該是可以為中國今後的發展道路提供一個平衡觀點的吧。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所長